

A Study on Japan's Neo-Conservatism Strategy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50 周年院庆丛书

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研究

李秀石 著

A Study on Japan's Neo-Conservatism Strategy

时事出版社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50 周年院庆丛书

图书记编目 (CIP) 数据

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研究

A Study on Japan's Neo-Conservatism Strategy

李秀石 ◎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研究/李秀石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80232-341-4

I. ①日… II. ①李… III. ①新保守主义—研究—日本 IV. ①D7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6195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18 千字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馆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 言

著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撰写《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研究》一书。为了科学、实事求是地阐述冷战以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著者努力追溯源头，研究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梳理分析庞杂的政治现象，提炼内在规律。

日本新保守主义势力提出构筑“后战后国家体制”的战略目标，意欲从国家体制的脊樑——《日本国宪法》中彻底清除战败的痕迹，将彰显“值得骄傲的历史与传统”的“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作为“后战后国家体制”的精神支柱——靖国神社是它的载体。为此，日本政坛的新保守主义力量致力于摆脱“战后国家体制”的束缚，重构“后战后国家体制”振奋“民族精神”，在修改“美国占领当局指导制定”的现行宪法以解除限制军事领域的制约，恢复被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总司令部（GHQ）废除的国家扶持和管理靖国神社的特殊关系这两个重大问题上发起挑战。这类挑战始于20世纪50年代持续至今，在许多新老保守主义领军人物的战略设想和竞选纲领中都有表现，但能否落实在执政实践中则是新老保守主义政治家、20世纪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家与21世纪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家的分水岭。著者通过论证20世纪日本新保守主义的鼻祖——中曾根康弘与21世纪日本新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人之间的思想继承关系及差异，努力揭示日本新保守主义政府的台前幕后，分析日本新保守主义领导人的政治理想与执政模式及其特点。

著者关于日本新保守主义翘楚的分析，包括其掌权以前、执政期间和卸任以后，从这个角度分析其推动修改宪法的政治轨迹，提出历任新

保守主义内阁首相在修宪、尤其是修改关于禁止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政府宪法解释”这一事关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上，无一不是上台前积极、上台后消极、下台前后积极的结论，并由此判断美国主导下的日美同盟的升级目标——“美英同盟化”不会在短期内顺利实现。

21 世纪以后历届日本新保守主义政府的国家战略规划及其实施情况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著者论证了 2009 年下野前的自民党政府制定并实行对华“亦友亦敌”的战略定位及其对华“合作、竞争、防范、遏制”并举的战略布局。即：与中国在经济上开展互惠合作；在外交上肯定中日两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在进行个案合作的同时“争夺地区主导权”；在安全战略上把中国作为“假想敌”进行防范和战略遏制；试图在亚太地区构建“国际新秩序”约束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不能“采取非协调性行动”。为了全面考察日本国家战略，除日本安全和外交领域外，本书还涉及经济领域，论述了近年日本朝野大力推行“资源外交”的战略性举措。

鉴于日本有望建立自民党与民主党竞争上岗的两党执政体制，著者将考察冷战后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的视野扩大到冷战后上台的第一届非自民党内阁——1993 年 8 月组建的以日本新党代表细川护熙为首相的八党派联合内阁，从政治经验丰富的老牌执政党的自民党政府、没有执政经验的非自民党政府两个角度，分析对比细川内阁的战略规划与自民党新保守主义内阁的战略规划之间的异同，为思考日本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的总体趋势，以及目前民主党政府逐步明示的国家战略提供启示。

严重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动辄掀起外交风波的靖国神社问题也是本书阐述的重点之一。为解读靖国神社问题的政治结构，弄清靖国神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及其与政治、宗教、外交及防卫等领域的关联，著者追溯至靖国神社与日本“近代祭祀政治”的源头，从长达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政治现象中，梳理出靖国神社在战前军国主义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及作用，战后在新老保守主义势力争夺政权及巩固政权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新保守主义构筑“后战后国家体制”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政治功能，通过分析 21 世纪后靖国神社问题的结构性变化，论证解

决靖国神社问题的各种方案及其展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读 20 世纪新保守主义思想的鼻祖中曾根康弘、21 世纪后掌权的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三位首相既利用又受制于靖国神社问题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在处理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现实主义手法,充实新保守主义执政模式的佐证,提出日本领导人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衡量其“历史认识”的唯一尺度,“历史认识”也不是判断中日政治关系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指出:“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日本战败后,“吉田保守主义”翻过“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的一页。21 世纪后,聚集在日本新保守主义旗帜下的政治精英又翻过了“吉田保守主义”的历史的一页。历史不会重演,剖析日本新保守主义构筑“后战后国家体制”的奋斗历程,令人深思。现在,既不能用“复活军国主义”来评估当前日本加强军事力量和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的扩张,也难以用“鸽派”和“鹰派”、“左翼”与“右翼”的范畴来划分日本的各种政治势力。衷心希望此书有助于读者与著者共同认识 21 世纪的日本,共同思考日本将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发挥的作用及其给中国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带来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著 者

于农历庚寅年正月十五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日本新保守主义概论	(1)
第一节 日本新保守主义的界定	(1)
第二节 新保守主义的鼻祖——中曾根康弘	(11)
第二章 新保守主义的政治理想与执政实践	(25)
第一节 中曾根与战后保守主义修宪运动	(26)
第二节 中曾根的政治理想与执政实践	(35)
第三章 “战后政治总决算”与靖国神社	(48)
第一节 靖国神社“祭祀政治”的历史渊源	(50)
第二节 神道“国教”化与靖国神社“造神”	(55)
第三节 战后围绕靖国神社的政治斗争	(62)
第四章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保守主义	(70)
第一节 《冷战以后》的战略设想	(70)
第二节 海湾战争与“负责任的和平主义”	(76)
第三节 90 年代的修宪与“论宪”	(82)

第五章 日本的历史问题与世界人权运动	(88)
第一节 “历史认识”的进步及其反动	(89)
第二节 联合国组织追究日本政府责任	(94)
第六章 日本新保守主义政治群体组织化	(105)
第一节 政界势力重组与右倾化	(105)
第二节 集结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	(114)
第七章 冷战后日本加强防卫力量	(123)
第一节 探求日本自主防卫之路	(123)
第二节 打造“合理、高效、精干”的自卫队	(130)
第八章 小泉、安倍内阁的新保守主义战略	(142)
第一节 小泉内阁整備国内战时法制	(142)
第二节 安倍内阁构筑多层次安保框架	(150)
第九章 “资源外交”加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166)
第一节 构建“三位一体”资源战略体制	(166)
第二节 日本对中亚地区的资源外交	(170)
第三节 日本对中东地区的资源外交	(178)
第四节 日本对亚洲地区资源外交的特点	(184)
第十章 “新福田主义”应对地缘政治难题	(191)
第一节 四大地缘政治难题困扰日本列岛	(191)
第二节 “新福田主义”的可行性及局限性	(202)
第十一章 麻生内阁与“多层次安全保障战略”	(211)
第一节 “国际新秩序”与“中美共治”博弈	(212)

第二节 构筑“多层次安全保障战略体系”	(219)
第十二章 21 世纪靖国神社问题的演化与中日关系	(229)
第一节 靖国神社问题的结构性变化	(229)
第二节 解决靖国神社问题的方案及展望	(246)
第十三章 新保守主义首相的“历史认识”与国际制约 ...	(258)
第一节 “历史认识”导致东亚外交困境	(258)
第二节 “西方”反击“历史修正主义”	(263)
第十四章 “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战略抉择	(277)
第一节 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战略意义	(279)
第二节 在“宪法禁区”前徘徊	(285)
第十五章 新保守主义战略与中日战略合作	(299)
第一节 非自民党内阁“樋口报告”的启示	(299)
第二节 中日战略合作任重道远	(304)
第三节 民主党选战前的“模糊”战术	(310)
引用文献资料目录	(319)

第一章

日本新保守主义概论

第一节 日本新保守主义的界定

何谓日本新保守主义？先行研究关于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定义作出以下阐述。新保守主义势力以自由党、自民党鹰派和 2000 年 4 月从自由党脱离出来的保守党、垄断财团、防卫厅、外务省、文部科学省官僚及一批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为骨干，力主以“政治新思维”取代旧的冷战思维，实行“平成政治维新”，重塑日本的“国家像”，最终目的是实现日本继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化之后的所谓“第三次开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包括“笃信新保守主义的中曾根内阁”，“鹰派”政治家桥本龙太郎和小泽一郎。1995～1996 年桥本龙太郎和小泽一郎先后当选自民党首相和自由党党首，“标志着‘鹰派’新保守主义势力正式接管日本政权”。小泽的思想主张是“新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①也有学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认为新保守主义是影响 21 世纪日本的掌舵

^① 张广宇：《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93～94，100 页。

人——新生代政治家的主流思潮。^① 此外，还有不使用新保守主义用“新右翼”界定日本政界力量的观点：“新右翼是介于传统右翼和极右翼之间的政治派别，它比传统右翼更右，却比极右翼温和。”^②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以石原伸晃为代表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是崛起的“新右翼”，小泉纯一郎等倡导和实施修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化战略、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和否定历史，也是“推动日本右倾化的右翼力量”。有的学者从研究日本社会政治思潮的角度提出“民族保守主义”是目前日本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潮，安倍晋三是“民族保守主义”在政界的“最高代言人”。^③ 也有学者从日本政治结构变化的角度提出，安倍政府“具有战略派属性并推行‘新现实主义’”，给日本政治带来“权力模式与决策机制重心的转移”等三个转变。^④ 先行研究都曾提出，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等政治家在日本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和提升日美军事同盟的过程中，小泽一郎在冷战后推动日本军方参与国际活动的过程中，皆发挥了划时代的重要作用。^⑤ 在上述代表人物中，21世纪掌权的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三人多被冠以“鹰派”、“右翼”或“极右翼”的头衔。

日本方面界定新保守主义主要有广义与狭义两类观点。广义的界定把“与传统保守主义政治相异”的小泽一郎的思想主张，以及90年代包括所有新老政党在内的各种涉及“改革”宪法、政治和安全保障的理论，一并划归新保守主义，浅井基文所著《日本新保守主义》即持有这一观点。^⑥ 狭义的界定把80年代中曾根政府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政治大国化、日本作为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发挥作用等规定为“新保守主义”，将90年代自民党下台，“五五年体制”崩溃后，日本政治“总体

① 吴寄南：《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导言”。

② 张广宇：《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第100页。

③ 杨伯江：“决定安倍政权与中日关系走向的关键点”，《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期。

④ 高洪：“安倍政权的政治属性与政策选择”，《日本学刊》2006年第6期。

⑤ 刘江永：《彷徨中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⑥ 浅井基文：《日本新保守主义》，新华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

保守化”所表现出来的主流政治思想规定为“新民族主义”，认为 90 年代的新民族主义与 80 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有很大不同：第一，新民族主义尝试通过回归民族和传统来重建日本的认同感，为此就需要“对历史加以修正”。第二，对和平宪法、民主主义教育等一系列“战后”进行改写。^① 还有参照美国界定新保守主义的划分方法，把参加 2001 年 11 月成立的“确立新世纪安全保障体制年轻议员之会”的超党派国会议员，统称为“日本版新保守主义”，《朝日新闻》2003 年 7 月 3 日发表题为“‘修改专守防卫、集体自卫权’，超党派议员声明扩大影响”的评论，即是日本媒体代表性的观点。不过，日本学界关于日本新保守主义的论述不如媒体多。学者大多评论具体的政治现象或人物，似乎避免对仍然活跃在政坛的分析对象勾勒全貌。如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正彦曾在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安倍晋三是“历史修正主义”，而认为麻生太郎除去与家族有关的问题外，基本没有否定历史。

著者认为，日本新保守主义作为主导日本政治的思想潮流，已经走过 20 余年的成长道路。这个过程常常被解读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或军事大国化的过程，以及日本的右倾化。较早提出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政治家，往往被称为“鹰派”和“右翼”，比他们更“右”的政治家则称为“极右翼”。但是，这样的界定不能全面反映其政治面目，需要作进一步的区分：（1）新保守主义作为政治思想，已由少数政治家的思想观点扩散为新生代政治家群体的政治主张，他们拥有基本一致的战略目标和政治抱负。（2）21 世纪的新保守主义已经在政界占据相对稳定的地位。而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新保守主义政治家掌权还只是昙花一现。中曾根自民党内阁与后来执政的多党派联合政权细川护熙内阁、村山富士内阁之间存在政治断层。（3）20 世纪 80 年代，新保守主义思想在自民党内尚未形成主流，以中曾根康弘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家难以与以宫泽喜一等人代表的稳健的保守主义相抗衡。二者对立冲突的结果是，新保守主义在修改宪法和“公务参拜靖国神社”等重大政治问题上

^① 毛里和子：《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徐显芬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51～152 页。

受挫。(4) 21 世纪后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家不再书写历史片段,而是在制定、实施日本的国家战略。仅仅 7 年多的时间,新保守主义战略已经发展到稳健的保守主义政治家福田康夫主政后只能搁置不可逆转的稳固程度。(5) 新保守主义政治家从个体发展壮大为群体,无论是主要执政党自民党还是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内,都活跃着一个新保守主义政治群体,这些横跨朝野各党的新保守主义者拥有近乎同样的奋斗目标和基本一致的政治主张。他们除了努力实现本党和本人的政治理想、跻身或夺取权力中枢的政治利益外,还在为实现新保守主义构筑“后战后”国家体制的政治目标而奋斗,他们在国会内外遥相呼应,形成一股思想互动性极强的超党派的政治力量。因此,有必要根据日本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政界力量的变化,结合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对日本新保守主义进行缜密分析。

著者认为,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去除战败国的痕迹,构建“后战后”国家体制,为此制定或修改法律法规,调整国内政策与外交安全战略,重建军事力量及相关国家体制。日本新保守主义的主要目标与战后的保守主义——“传统”或“老”保守主义之间既有共性也有特性。新保守主义是对保守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非离经叛道。

(一) 关于新老保守主义之间的异同作简要概述

1. 新老保守主义的主流都在日本自由民主党,他们必须遵守自民党的政治纲领。这一组织系统决定他们必须与党纲规定的大目标保持一致,但二者在如何实现政治目标的途径和具体方法上存在较大区别。例如:自民党自建党伊始就把修改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列入党纲中。许多老保守主义政治家经历数十年的修宪与护宪的政治斗争后,已经变成党内稳健派,采取事实上维护宪法特别是宪法第九条的政治立场,另一部分党内右翼组建了推进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议员联盟。与此相对照,新保守主义者则在通过渐进方式架空宪法的同时,全力推动修宪所需的法制建设。

2. 新老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很多共性:否定和美化日本过去殖民侵略的历史;振兴与天皇制意识形态相结合的神道祭祀——恢复国家庇护并管理靖国神社的特殊关系;反对贯彻反省战争错误、普及提

高民主主义意识的教育路线，确立宣扬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国家至上主义的教育方针等，几乎囊括广大日本民众视为保守或右倾的全部政治问题。但是，新保守主义的主张更为激进且具有更大的可行性，落实主张的实际行动能力远远超过老一代保守主义政治家。

3. 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共性，新老保守主义翘楚都是加入党内右翼团体、参与制定自民党各项政策和战略的主力。通过本书的实证与分析可以验证一个事实，新保守主义团体的组织者，无一例外担任过老保守主义组建的右翼政治团体的重要职务，他们在老一代右倾政治家团体的母体内羽翼丰满后，脱颖而出创建自己的政治联盟。

（二）考察新保守主义群体的政治特性

1. 新保守主义政治家在台上和台下的政治表现不同，担任内阁大臣尤其是首相职务后，其实际作为往往不能兑现或完全兑现竞选承诺。例如，21世纪的新保守主义领军人物都在竞选之际提出了打破“行使集体自卫权”禁区的口号。小泉纯一郎在选举造势中尤其强调日本必须行使“作为国家主权”一部分的“集体自卫权”，但在上任后并未实现诺言，仅仅通过发表讲话的方式迂回推进，表示“应该保卫在日本周边活动的美军舰艇”。又如，执政仅一年的安倍晋三首相，在距离辞职2个月前设立首相私人咨询机构“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恳谈会”，指示研究日本自卫队能否在四种情形下行使与美军间的集体自卫权问题。再如，麻生太郎首相一上任就在纽约表态说：“基本上应该改变”政府关于不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解释，^①但一周后又在参议院答辩说：“尊重以往的政府解释”，关于政府的宪法解释应该进行充分的讨论。^②以上列举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想与执政目标之间出现断层的共通现象，可以追溯至新保守主义鼻祖——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2. 与老一代为了政治主张不惜辞职丢官不同，新保守主义政治家

① 「麻生首相：集団の自衛権『憲法解釈変えるべきだ』見直しを明言」、『毎日新聞』2008年9月26日、東京夕刊。

② 「麻生首相：集団の自衛権『政府解釈を尊重』」、『毎日新聞』2008年10月3日。

具有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政治姿态的灵活性和应变性。作为首相和外相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即是一个典型事例：小泉首相在任期间每年参拜靖国神社恶化与邻国的关系，与其说是本人的一贯立场，莫如说出于营造有利于构建日本战时法律法规体系的政治氛围的需要。安倍出于扭转日本与亚洲邻国间的外交僵局的考虑，采取不明确参拜与否的姿态，通过奉献盆栽祭品，一方面表达对靖国神社的特殊关照，表明其并未改变右翼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也避免与战争受害国之间产生新的摩擦。因此，新保守主义政治家在处理参拜靖国神社这个敏感问题上，表现出优先解决首要执政目标，暂时搁置长期性的政治目标及政治理想的灵活姿态，执政手法彰显实用主义。这与以奥野诚亮为代表的右翼政客一意孤行激怒邻国、然后辞职或被罢免的行为模式完全相反。小泉首相访韩时参观纪念日本侵略历史罪行的南大门（监狱遗址）纪念馆，访华时前往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回国后则一如既往参拜靖国神社并声称这是“个人感情问题”，如此上演“国际政治秀”和“外交秀”的日本首相，在老一代保守主义者中无人能比。

3. 新老保守主义最大的不同是，老保守主义者不愿根本转变重经济、适度发展军事力量、依靠日美同盟体制而不愿承担更多军事义务的“吉田保守主义”路线。新保守主义的政治目标则是扭转吉田保守主义，追求日本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化，在提升日美同盟的同时，实现日本安全战略自主自立，确立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新保守主义思想鼻祖中曾根康弘描绘的政治蓝图，在小泉、安倍、麻生三位首相执政期间不断增添新内容。

与战后日本政治的出发点“吉田保守主义”相对照，中曾根康弘的思想主张及其实践活动是日本新保守主义的起点。二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制定首先实现战后经济复兴，拒绝投入巨额资金重整军备力量的保守主义路线，奠定了日本战后较长时期内走重经济轻军备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吉田茂在日美缔结旧金山和约的交涉过程中，拒绝接受美国特使杜勒斯要求日本重建军事力量的媾和谈判条件，选择了优先发展国内经济的道路。“关于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杜勒斯认为

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看，日本继续保持没有军备的状态，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因此，作为媾和条件，主张重整军备。但是，我公开反对了这种重整军备论”。吉田茂提出四个反对的理由：其一，日本在经济上还没有复兴，而且为了实现经济独立，日本正处于不得不强迫国民过艰苦生活的困难时期，为非生产性的军备花费巨额资金，将会严重推迟日本的经济复兴，“这种作法就好像让瘦马负重载一样”。其二，“现代的军备需要花费巨额资金”。重整实际有用的军备就会破坏日本经济，否则，“只能建立无济于事的军备”。其三，日本已经失掉了作为重整军备的后盾的心理基础，对于曾经被迫参加毫无道理的战争的国民来说，战败的创伤依然存在。其四，“日本如果重整军备，也许会刺激亚洲的邻国”。吉田茂始终坚信，重经济轻军备的决策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政策，而且是明智的政策。即使在日本已经摆脱战后初期的困难、建立陆海空自卫队之后，面对美国要求日本重整军备对抗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他仍然表明日本在国际关系上应尽的责任并不是大幅增加军备，“只是增加军备，也许不是最好的政策。最根本的策略似乎是使东南亚稳定下来，然后通过东南亚对中共进行工作”。^① 所以，优先发展经济、建立最低限度的自卫力量的“吉田保守主义”，成为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思想基石。美国国家档案馆 2006 年 8 月解密的驻日盟军总部（GHQ）的一份秘密备忘录表明：1951 年，前日军中将 Torashiro Kawabe 等人创立的“地下政府”决定建立日本新陆军。1952 年 2 月，Torashiro Kawabe 等人提出建立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宪兵部队”的计划，该部队由一个毒气单位、一个机枪单位和一个坦克单位组成，由宇垣一成和 Torashiro Kawabe 分别担任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二人曾考虑赴美解释他们的设想。这个计划虽然得到盟军总部的同意但并未被采纳，其原因可能是遭到美国政府领导人和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反对。有分析指出，日本地下政府是指由前日军高级将领创立的组织，意在从各方面对日本和美国政府施加影响。当时，日本自卫队的前身“国民警

^①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年版，第 69、92 页。

卫队”尚未成立。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1950年7月驻日盟军总部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命令日本政府建立了日本国民警备队。^①上述史实再次证明吉田茂政府反对重整军备的坚定立场。1957年5月20日，日本制定《国防基本方针》规定四项基本方针：（1）支持联合国的活动，谋求国际间的协调，实现世界和平。（2）安定民生，发扬爱国主义，建立保障国家安全所必要的基础。（3）根据国力和国情，在自卫所必需的限度内，逐步发展有效的防卫力量。（4）对于外来侵略，依靠同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予以阻止，直至将来联合国有能力有效地制止这种侵略时为止。在《国防基本方针》的指导下，历届日本政府奉行“联合国中心主义”，不但追随美国、依靠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联合国应对国际纷争，而且期待联合国未来能够提供安全保障，全力引进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增强经济实力。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保守主义路线为日本战后摆脱贫困和混乱状态，迅速接近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出了贡献。

“吉田保守主义”路线长期影响日本国家发展轨道，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原因：

首先，日本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第9条不仅限制日本重整军备，而且规定日本不得使用武力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其次，战后强大起来的在野党阵营——日本社会党、共产党、民社党、公明党都在其党纲和基本政策中提出：拥护和平宪法，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分阶段解散或改编自卫队，反对美军基地，废除或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反对军国主义复活，走和平中立的非武装道路，这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外交和安全政策形成强大的制约。吉田茂内阁通过扩大解释宪法，于1954年与美国缔结了《相互安全保障协定》（MSA），决定3年内建立18万人的用于自卫的军队，并于当年正式成立防卫厅和自卫队，因此受到在野党和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而被迫辞职。其后掌权的岸信介内阁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引发各界民众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反对运动。由社会党、工会总评议会、护宪国民联合、恢复日中邦交会议等100多个市民团体组成的“阻止修改安保条约国民会议”，从1959年4月15日到1960年6月22日总共

^① 中新网 2006 年 8 月 21 日电。